

※書刊評介※

國家、戰爭與個體的命運——讀木山英雄所著《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

趙京華*

木山英雄著：《周作人「對日協力」の顛末：補注『北京苦住庵記』ならびに後日編》，東京：岩波書店，二〇〇四年。6+四九〇頁。

本書是日本中國學家木山英雄所著有關中國作家的一部傳記。眾所周知，周作人(1885-1967)是一個複雜而多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在動盪的近現代史中他經歷了幾次重大的人生抉擇，如清末赴日留學，五四時期參與文學革命並倡導人的文學和思想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決心致力於現代散文（小品文）的創作，與現實政治拉開距離而積極從事文明批評的工作，一九三〇年代從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傳統到回歸「原始儒家」，致力於傳統與現代的創造性轉化等等。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擇不僅塑造了作為歷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也構成了一個個社會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識人依然在關注的對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擇，都沒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他的一系列選擇之影響來得更為重大和深遠。從決意滯留淪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權要職，最後受到國民政府的審判，在歷史脫出直線發展的軌道而發生「轉彎」的關頭，周作人一步步遠離了浴血抗戰的中國和主流知識分子群體，並走進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個階段。這不僅給他個人的命運以決定性的打擊，而且如木山英雄所言，也給他的同胞和民族，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造成了難以癒合的傷痕。因此，以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為一個歷史單元來記述周作人的傳記，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

* 趙京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然而，這個歷史單元乃是中日關係，以至東亞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其中不僅交織著殖民侵略與被殖民被侵略之間抵抗與屈從的複雜關係，而且生活於其中的每個人都要面臨由國家、民族、文化和個人所構成的關係鏈條達到緊張極限的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而有了每個人不同的抉擇及其人生命運。木山英雄的《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便首先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在傳記敘述結構和方法視角上確定了三個層面。第一，從「事件史」的層面盡可能詳細地敘述圍繞周作人構成的一系列「事件」，如「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1937年），大後方和抗戰地區對其附逆事敵的聲討（1938年），元旦狙擊事件（1939年），出任偽職的前前後後（1940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掃蕩反動老作家（1943年），以及戰後的漢奸審判（1946年）等等，構成了傳記的結構主線。第二，在「事件史」的大背景下，從人物傳記的層面深入挖掘和梳理傳主在一系列「事件」關係中個人的言行與抉擇過程，尤其注意每一次抉擇後面的深層思想和心理動機，由此呈現出傳主此一人生階段的「精神史」。第三，作為那場侵略戰爭的加害國國民，同時也是一位關心革命中國的日本知識分子，傳記作者木山英雄還試圖在「事件史」和「精神史」之上，去嘗試觸及「從中日戰爭本身的複雜性到日本人與中國人乃至亞洲人之間的相互聯帶與理解，或者不如說其沒有聯帶和不理解，特別是日本人那種器量能力的問題」（〈後記〉）等。由此，也就獲得了超越一般道德判斷，而更側重經驗性史料的實證分析和自然而然的對於人之關懷的立場。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的學術和思想內涵就遠遠超出了一般的人物傳記作品，而具有了反思戰爭歷史和中日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對傳主做出冷靜觀察的思想史品格。

我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除了從「事件史」方面瞭解到一些重要的珍貴史料，並對不正常的國家關係下，中日兩國那一段非對等的文學交流歷史（如圍繞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文學報國會眾多成員與周作人及淪陷下中國北方文壇之間的交流）有了新的認識之外，更關心傳記作者從民族國家、文化同一性和個人自我這三者的關係方面，對傳主「精神史」所做的獨到解讀。眾所周知，自現代民族國家建制以來，傳統的絕對主義君權體制開始崩解，社會出現了明顯的分層，國民作為獨立的個體被置於由國家、社會、文化和個人等構成的關係結構中。當現代民族國家正常運轉時，這個關係結構有較強的流動性，個體在其中的自由選擇度也比較高，甚至可能獲得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立場。然而，當戰爭爆發或者遇到外敵入侵的時候，社會進入戰時體制，三者關係中的民族國家共同體這一端得到極度的強

化，原有的關係結構失掉平衡，其流動性和選擇的自由度也將受到嚴峻的限制。所謂身處「歷史關頭」個體將面臨選擇的危機，就是指此。那麼，周作人是怎樣在三者關係之間做出選擇的，其選擇又如何影響到他個人的命運呢？

這也正是《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始終一貫不懈追問的問題。例如，在分析抗戰前夕周作人的「日本研究」，特別是所謂「東洋的悲哀」這一命題時，木山英雄發現：「周作人如今走的已不是白樺派式的道路，不是世界人類，而是從亞洲各民族的命運出發，而達到了將國家主義相對化的境地。」（頁 37）但是，這文人式的「亞洲命運終歸一致」的想像並不能改變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和戰爭不可避免的現實，日本對中國終於挑起戰端。而周作人出於種種考慮，決心滯留淪陷下的北京，在保持一段時間的沉默之後，更決定出任「偽職」，甚至官至偽政府教育督辦和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開始打破沉默著文講話。這個時候，他是如何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如何去面對國家、民族和個人這個失去了平衡的關係呢？木山英雄注意到，不管有著多少辯解的成分，淪陷時期周作人以「中國人的思想」論為中心的一系列言論，在邏輯上與戰前的「東洋人的悲哀」命題，特別是和胡適討論時局的文章〈國語與漢字〉（1936 年）所反映的思想保持了一貫性。即，周作人始終堅持並以此來支撐自身的，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而是「中國民族」之文化同一性。也就是，當國家處於軍事上敗北、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不斷擴大的狀況下，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用同一的「漢字」、「漢文化」（原始儒家思想）來維繫民族上「文化乃至思想感情」的統一。

然而，「中國」並非單純的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不管日本帝國憑藉經濟軍事上的實力如何蹂躪，甚至使其大部分國土處於「淪陷」的被占領狀態，作為實體的中國「國家」並沒有消亡。當一九四五年日軍在中國戰場徹底敗北後，這個作為實體的中國又成了周作人必須認真面對的，而且是以「漢奸懲處條例」置其於被告席上的國家。於是，我們目擊了他一生最痛苦殘酷的時刻——必須在法庭上為自己戰爭期間的行為做出解釋。而這時的他又是在上述無法逃避的三者關係中辯訴的呢？《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也正是於此對傳主提出了尖銳的剖析和批評。木山英雄通過對大量審判資料的解讀，最終得出結論：周作人在回答年輕記者黃裳的獄中質詢，講到「國家的大法」時，並沒有考慮到介乎其間的個人行為對於全體同胞的客觀意義需要闡明，並將這個「國家」視為國民的機關。「我們從他法庭上的辯訴中，要感到他面對這種全體性而展現出來的人之虔誠性，是極其困難

的」。與同樣是漢奸被告的陳公博在法庭上雖強調自己「和平抗日」卻最終伏法，以及王揖唐在接受判決時的沉默不語相比，周作人三番五次幾近於「俗」的辯訴態度卻正相反。木山英雄沉痛地指出：「然而，他最終沒能通過這場審判，進而找到試圖在與全體同胞之關係上解釋個人如此結局的邏輯。幾近於『俗』的辯解或許會減輕一時的負擔，但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終歸是一個不幸。」（頁 298）

以上介紹顯示，木山英雄從民族國家、文化同一性和個體自我三者關係方面來解釋周作人的言行，他沒有刻意強調關係結構中的某一方因素，而是基於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綜合地細心把握周作人的每一次抉擇及其背後的心路歷程和思想動機，從而在表達同情理解的同時，做出自己特有的判斷和批評。這樣的「精神史」敘述，在讓讀者心悅誠服的同時，更能激起進一步思考的欲望。這恐怕是該書最精彩也最有閱讀價值的地方吧！

另一方面，從個人精神信念方面，來思考周作人如何度過戰爭時期一個個人生難關的，也是該書關注的焦點之一。比如「不辯解說」這種「沉默的美學」，與周作人早年「生活之藝術」的理想之關係。木山英雄認為，這個於一九二〇年代提出的理想境界到後來其大的框架沒有改變，但「生活之藝術」的內涵漸漸更突顯了作為立身處世的藝術這一面。總之，周作人終究是這樣一個人物，即認為人類或個人面對無可奈何的壁壘時，與其反抗不如幽默為好。他將自己從與被占領當局或傀儡政權接觸，從而造成的不抵抗之恥辱中搭救出來的根據，也便是這個「生活之藝術」。除此之外，周作人還有一個人生支柱，即由自稱「異端」而獲得思想上之緊張（抵抗）與自豪（幽默）的人生哲學。木山英雄在該書最後指出：「我至今依然覺得，面對歷史本身激盪的發展變動，他曾有過的那個抵抗並沒有真正實現，但自稱『異端』所獲得的緊張和自豪支撐著他不斷地工作，使他在那個時代中頑強地生存下來了。」（頁 330）讀到這裏，我多少明白了以前對周作人的不解——即使在南京老虎橋獄中，他亦能夠以餅乾盒上架木板當書桌，而翻譯《希臘女詩人薩福》，並創作了大量詩歌，由此度過人生的最大一劫。

《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彷彿是一株不斷生長的老樹。它初版於一九七八年，原由日本筑摩書房出版，書名為《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後來，隨著新史料的不斷出現和周作人愈來愈受到中日兩國學術界的矚目，傳記作者木山英雄也在繼續關注戰爭時期的周作人，寫下了一些後續的研究文章。二〇〇四年，在改版由岩波書店出版之際，則特別增加了「後日編」部分，並以「補

注」的方式把二十餘年來新發現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消化於傳記之中，而改換了一個長長的新書名《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補注《北京苦住庵記》及其後日編》。因此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有關戰爭時代之周作人的史料最為詳盡，並具有獨特思想批評深度的傳記。

如前所述，自「七七事變」之後，周作人便漸漸遠離了主流知識分子群體，而經過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根據「漢奸懲處條例」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之後，他的名字便從公眾社會消失了，甚至遭到了學術界的忘卻。直到一九七八年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周作人才又回到人們的關注視線中。這期間，中國學者對於周作人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甚至在一九九〇年代於專業研究領域之外，一時出現了「周作人熱」，其作品得到重印並受到廣泛的閱讀。然而客觀地講，受歷史材料和研究者視野的局限，有關戰爭時期的周作人，其研究依然不夠深入透徹。這不僅影響到我們對周作人全人和全部思想、文學的整體理解，而且妨礙了我們以此為媒介深入觀察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中日關係史的視野。而隨著大眾性「周作人熱」的退去，近幾年大陸研究界也呈現出比較沉寂的局面。因此，希望此書在漢語學術界的翻譯出版，能夠對打破這種沉寂局面起到某種促進作用。《周作人「對日協力」始末》其獨特的價值如上所述，在於以下兩方面。一是作為「事件史」從日本方面挖掘收集到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特別是圍繞元旦狙擊事件，和周作人出任偽職前後來自日本方面的種種威逼勸誘，還有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日本各路文人、作家與周作人之間發生的種種關係等。木山英雄在一九七〇年代通過大量的史實調查，和對日方仍健在的當事人進行走訪，獲得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這些材料多數依然是目前漢語學術界所不知的。二是基於「經驗性的考究和自然而然的對於人的關懷」，針對周作人日偽時期一系列言論行動背後「動機」的細緻入微之解讀，特別是基於國家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個體自我三者關係對其「精神史」所做鞭辟入裏的剖析，足以促使讀者重新回到歷史現場，設身處地地去理解周作人的心路歷程。比起一些研究者從民族國家之大義出發，居高臨下地進行道德價值判斷來，這樣的解讀反而更能使我們體味到那個戰爭時代的黑暗和殘酷，以及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內心的苦楚和無奈，從而提升我們對於歷史和道德本身的價值判斷能力。